

片帆敵愾震四海—— 日本漢文小說《海外異傳》中英雄書寫 的敘事結構*

劉家幸**

〔摘要〕

十九世紀五〇年代的日本，飽受內憂外患之苦。面臨西方列強屢以武力東進並訴求開國之威脅，幕府竟束手無策，權威蕩然無存。時日本國內有志之士遊說各地，疾呼尊王攘夷論，倒幕聲浪不絕於耳。稍於此前，作為保幕攘夷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津藩碩儒齋藤正謙(1797-1865)，曾於嘉永三年(1850)出版漢文小說《海外異傳》，表明其政治立場。是書以明末清初東亞鄰海諸國間，緊張混亂之政治情勢為時空背景，通過「出航——討逆——歸返」之敘事結構，以日人山田長政(1590-1630)之稱霸身毒、濱田彌兵衛(?-?)之要脅紅毛與南明鄭成功(1624-1662)之統治台灣三件海外征戰故實為題材。在個別線性事件之發展脈絡中，作者每以「陸地——海洋」之空間移動，為草莽英雄開闢一處能夠伸展其志的舞台。同時，本文藉由英雄海上航行之情節，嘗試探究文本中幕末志士團結抵禦外侮的理念。

關鍵詞：齋藤正謙、海外異傳、日本漢文小說、陸地／海洋、英雄書寫

* 本文承蒙二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修正意見，特致謝忱。

**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外國人共同研究者，2018年科技部「補助博士後赴國外研究(甲類)」受獎人，計畫名稱：「日本漢文小說研究之反思與重構——以明末清初黃檗僧人在日著述及出版為考察中心」(核定編號：107-2917-I-564-048)。

一、前言：《海外異傳》之成書背景

十九世紀伊始的日本，時局不靖。對於多數歷史學家而言，此時的日本「從一個國土分封、政治分立、社會分裂和國際分離的國家開始了轉型。」¹儘管德川幕府欲持續為期甚久的鎖國禁令，以確保日本與外部世界維持常態、平和且疏離的外交關係，然而面對西方列強屢以武力試圖撞開門戶，幕府堅持的外交、海防政策終究無力抗衡。另一方面，日本國內伴隨幕藩封建體制鬆動，四民階級制度、地方大名行政自治以及與朝廷權力之角逐，亦逐漸走向失序；尤其，當天災人禍接踵而至，困頓、怨懟與疏離，皆導致內部的矛盾與衝突不斷深化。²

天保十二年（1841），齋藤正謙（1797-1865）³由津藩（今三重縣津市）大名侍講遷任郡宰，致力於執行天保改革以來中央所頒布戒奢抑商、獎掖文武諸令，當此之際，大清帝國敗於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1840-1842）。中國的慘敗帶給齋藤氏莫大震撼，他深刻體悟到：顛預腐敗、蒙昧迂闊實是清國取敗之由。而對於同樣面臨西強東漸的日本，倘若一意孤行「蔑視他邦，寘慮情於弗問，一旦有緩

¹ 詹森主編，王翔譯：《劍橋日本史（第5卷）：19世紀》（北京：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7。

² 相關議題參酌周一良：〈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農民運動〉與〈關於「明治維新」的幾個問題〉，收入《中日關係文化史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192-234；頁235-264。

³ 齋藤正謙字有終，號拙堂，又號鐵研，通稱德藏，致仕稱拙翁。為津藩士族之子，出生江戶柳原。少時入昌平黌，受業於朱子派古賀精里（1750-1817）。年二十四，應津藩第十代大名誠德公（1781-1825）之請，試補有造館儒員，因遷家西徙於津。往後歷任藩校講官、進班上士、大名侍讀、郡奉行等職；罷郡後，再入庠序，出仕藩校督學，總督文武學政。執事期間，立學則、舉人才，廣蒐書集，增建文庫；大興武場練兵，更選藩中賢與能，於都下習洋學及兵法炮術之事。方是時，天下文武人才之盛，首推津藩。齋藤氏平生好學，識通古今，又於諸史莫不淹貫，尤精於《史》、《漢》，多發明；且兼善漢詩文，卓然成家。畢生著述宏富，最是注意文章經世濟民之用，於田賦、法制、農政相關策議文書，亦多可言可行。相關生平事蹟，參見中內惇撰：〈拙堂先生小傳〉，齋藤拙翁著，中內惇編：《拙堂文集》（東京：山中市兵衛等，明治十四年〔1881〕刻本，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頁1上-5上；津市教育會：《津市文教史要》（津市：津市教育會，1938年），頁275-288；直井文子：〈齋藤拙堂年譜稿〉，收入齋藤拙堂原著，齋藤正和譯著：《全釈拙堂文話》（東京：明德出版社，2015年），頁609-670；以及齋藤正和著《齋藤拙堂傳》（三重縣：良書出版會，1993年）一書。

急，何以防之？」⁴另一方面，面向當時國內主張開國攘夷的激進分子，其亦疾聲呼籲：「前車之覆，後車之戒，視此亦可不自戒乎！我邦閉洋不通諸藩，至今無事，詢為長策。」⁵更明確指出：「今視清國之禍本生於濫交外藩，益知我法不可改也。」⁶

儘管齋藤氏公開支持幕府應維持鎖國外交傳統，但並不苟同其採取消極孤立的對外關係。相反地，他將鎖國視為權宜之計，目的在趁機謀略一套完善的攘夷辦法，以俾日後開國之路。齋藤氏先是強調明地理、通海外事情之重要性，早年除廣博涉獵東西洋地理書籍，更親撰《地學舉要》、《魯西亞外記》（佚）；逮鴉片戰爭爆發前後，始從過往對俄國事務之關心轉向英國，⁷並以為日本欲抵禦先進的船堅砲利，不僅須在武器設備、海防戰事方面做出合宜改良，當務之急仍在通過教育積極培養菁英、端正武家本源：「士以武為業，而其職必資於文。文所以知道也，士而知道，能事畢矣……然道外無事，一文一武，莫非道者……蓋士道雖廣，不過文武。苟知其不可偏廢，則職業舉矣。」⁸緣此，天保十四年(1843)在結束為期兩年的郡宰職務後，齋藤氏毅然投入藩校教職；同年，完成《海防策》。

嘉永三年(1850)，齋藤氏出版漢文小說《海外異傳》。是書以明末清初東亞鄰海諸國間，緊張而混亂之政治情勢為時空背景，纂輯日人山田長政(1590-1630)⁹

⁴ 齋藤正謙：〈鴉片始末跋〉，（日）齋藤竹堂撰、齋藤正謙評：《鴉片始末》（寫本年代不詳，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無頁碼。

⁵ 同前註。

⁶ 同前註。

⁷ 關於齋藤正謙之政治思想與分期研究，參酌齋藤正和著：《齋藤拙堂傳》，頁 116-129。

⁸ 齋藤正謙：〈士道要論自序（天保八年八月稿嘉永三年刊）〉，收入芳賀登監修：《日本道德教育叢書（第 8 卷）》（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1 年），頁 179。

⁹ 山田長政，生於天正十八年，卒於寬永七年（一說寬永十年），稱仁左衛門，傳為宮崎坊染工之後，或云薰科農家之子。少儻有大志，盼以武建功，而時天下初定，偃武休息，於是托商船入暹羅。會暹羅有六昆寇，山田氏以策獻國王，出兵大捷。後國王嫁其女，並委以國事之重責。寬永六年，國王殂，新王繼任，時王尚年幼，山田氏輔政，朝中多有異聲。先是王叔欲結黨剷除其勢力，為山田氏所平；爾後太后更與其黨羽謀圖竄逆，因以作亂，山田氏終為奸臣毒害。自正保四年（1647）蘭人フアン・フリート《暹羅史考》出版以後，關於山田長政之傳聞、事蹟散見於各種史料文獻、文學作品與圖像紀錄中，膾炙人口；如有智原宗因《暹羅国山田氏興亡記》（1680）、淡庵子《近代正說碎玉話》（1707）、河口靜齋《暹羅王詩》（1737）、塩谷宕陰《山田長政戰艦圖說》（1856）等，可謂一時佳話。迄於明治時期以降，

平定暹羅內憂外患、濱田彌兵衛¹⁰以暴抵制蘭人貿易威脅，及鄭成功(1624-1662)抗荷領治台灣三件海外征戰故實。是書文末有齋藤氏評語：「嗚呼！近歲洋夷陸梁，縱橫於印度支那之間，莫之能遏焉，使人慨然思斯三人，而立之傳，余豈徒然哉！」¹¹其試圖透過昔日草莽英雄海外建功事蹟，以喚醒今日幕閣與志士正視當前外交困境之意，不言而喻。¹²頗堪玩味的是，日本自古向來不乏對外宣揚國威、

與之相關的史學研究者輩出，包括關口隆正、間宮武、岡村信太郎、中村孝也、法月俊郎等人，咸有研究著作問世，此處不一一列舉。相關生平事蹟及近人研究系譜，參酌法月俊郎、飯塚伝太郎編：〈山田長政年表〉，山田長政顕彰会：《山田長政資料集成》（静岡：静岡教育委員会，1974年），頁412-428。

¹⁰ 濱田彌兵衛，生卒年代未詳，據《崎陽先民傳》云，其為人勇力，好氣任俠。寬永初年，因末次茂房前往澎湖之商船為蘭人劫取，濱田氏乃與其弟及子率長崎士兵七百人前往台灣，欲討回公道。先是蘭人不許濱田氏登岸，濱田氏及弟率徒二十人，入城突襲蘭人酋長哈喇吐嗶嗶嗶；後酋長叩頭謝罪求降，濱田氏取回所奪器械與向所掠之財貨，並囚蘭人四十餘人歸國。以其有功故，賜廩祿。盧千里著、原三右衛門校：《崎陽先民傳》（東都：慶元堂，文政二年〔1819〕刻本），卷下，頁2上-4上。自一八八〇迄於一九五〇年間，受到帝國主義與愛國思潮之流行，濱田氏搖身成為近代日本民族英雄，其抗荷事蹟不僅大量見諸當時的國民中小學教科書、課外讀物、人物傳記，乃至海洋學相關研究專著咸有論述。除日本國內，包括日治時期接受皇民化教育的台灣，同樣也可看見此一受容的痕跡。參酌林景淵：《濱田彌兵衛事件及十七世紀東亞海上貿易》，台北：南天書局，2011年；薛建蓉：《重寫的「詭」跡：日治時期台灣報章雜誌的漢文歷史小說》，台北：秀威資訊，2015年。

¹¹ 齋藤德藏著：《海外異傳（全）》（大阪：河內屋喜兵衛，嘉永三庚戌年〔1850〕刊本，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頁14上，別見王三慶等主編：《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3年），冊4，頁375-401。按：王氏另著〈東西交流史上漢文小說所表現的文化衝突〉，《成大中文學報》第17期（2007年7月），頁1-30，更就此書之成立背景與東西文化交流關係之議題詳細發明，可資借鑑。

¹² 《海外異傳》上梓後評價毀譽參半，儘管藩中諸侯給予極高讚美，然時尚有儒者如森田節齋（1811-1868）、谷三山（1802-1868）等人，以實證角度抨擊之，或云其取材記事簡陋失實，殆無史體可言；或以文學審度之，則小說中遣詞用字、文法，猶待商榷處亦多。見森田節齋：〈與齋藤有終書〉，島田泰夫編輯：《節齋遺稿》卷上（東京：博聞社，1881年），頁23上-25下。三山谷：《海外異傳商榷》二卷，奈良縣高市郡教育會：《三山谷先生遺稿》（奈良：奈良縣高市郡教育會，1917年），頁281-319。又，相關研究議題之梳理，參酌直井文子：〈齋藤拙堂の『海外異傳』とその匡謬書とについて〉及〈『海外異傳』の執筆「異」識〉二文，收入日本漢文小說研究会編：《日本漢文小說の世界：紹介と研究》（東京：白帝社，2005年），頁78-115。

抵禦侮辱之王侯將相，如卷首開宗明義云：

我大日本之為邦，寶劍開基，俗尚信義；將勇而士強，為四方所畏服。自倭武東伐、神功西征以降，以至比羅夫立功肅慎，田材丸震威蝦夷，源鎮西開祚流虯，源判官傳名東韃，平相州殲蒙古十萬眾，豐太閤屠鯢域破明師，並赫赫在人耳目，不待稱述也。若夫近世山田長政之霸身毒，山田彌兵之脅紅毛，鄭大木之王台灣，亦我皇之餘烈。而世或不詳其事，豈不惜哉，作《海外異傳》。¹³

舉凡倭武天皇、田村麻呂之東平蝦夷，神功皇后之西討三韓，阿倍比羅夫之伐佐渡島肅慎，源為朝之開琉球王朝，源義經之聲威遠播韃靼，北条宗政之殲元寇，豐臣秀吉之侵略朝鮮、聲援朝明戰事等，莫非顯赫一朝、名耀青史的人物。一旦面對此三位「世或不詳其事蹟，豈不惜哉」的近世草澤英雄，齋藤氏又當如何營構人物形象及其英勇事蹟，使得以接續「皇國之餘烈」耳？此問題一也。

復次，幕末以還涉及時事新聞的文學作品蓬勃發展，尤以鴉片戰爭為敘事背景而出現的各種文本魚貫面世。其中，主張尊皇攘夷的丹後田邊藩士嶺田楓江（1817-1883），曾據弘化年間（1844-1847）傳入的《夷匪犯境錄》改寫為假名小說《海外新話》五卷（1849），可謂彼類讀物之嚆矢。儘管該書問世伊始，因未經學問所（がくもんじょ）許可出版遂遭禁燬，編者與插畫者亦到受監押處分，然此書於民間流傳甚廣，密刻私售之事時而可聞。¹⁴稍後，種菜翁《海外新話拾遺》（1849）、醉夢癡人《海外餘話》（1851）二書，更採擷《海外新話》中未載錄各種鴉片戰爭之相關故事傳聞，並從其舊例創作，可視為續書之一環。齋藤氏素知此書，甚至在日後為嶺田氏文集所書序中，亦曾憶及此事：「余愛其才而哀其窮，無力能救之，聊弁數言以鳴其冤，冀有力者見而憫之。」¹⁵不僅如此，就文學體例來看，《海外異傳》的形式無疑受到《海外新話》啟發完成，最顯而易見的，便是卷首出自

¹³ 齋藤德藏著：《海外異傳（全）》，頁1上下。

¹⁴ 相關歷史事件之說明，參酌宮武外骨：《筆禍史（全）》（大阪：雅俗文庫，1911年），無頁碼；明石吉五郎：《嶺田楓江》（東京：博文館，1919年），頁23-29；增田涉著，由其民、周啟乾譯：《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67-72。

¹⁵ 嶺田楓江著：《楓江遺草》（東京：重城保，1891年），序頁3。

李門祐相（1812-1874）¹⁶之手的序文，全權模仿《海外新話》序文，以七言組詩綜攝書中故事大要的特殊型態。¹⁷就小說內容看，《海外異傳》雖不屬時事新聞，但緊扣海戰主題來凸顯島國文修武備的重要與必然性，其創作目的則與《海外新話》一致。至於在文學技法上，《海外新話》參考軍紀物語《源平盛衰記》、《太平記》之表現方式以改寫《夷匪犯境錄》，尤其給予齋藤氏啟迪。¹⁸關於嶺田楓江的思想行動與《海外新話》成書的關係研究，過往稱之者眾，¹⁹然而作為一種文學發展的對照向度，本文擬欲釐清的是：主張保幕攘夷的齋藤氏，緣於何故通過該部禁書的文學形式進行創作？是否隱然與嶺田氏構成某種對話關係？此問題二也。

最後，近人黃軼球曾就齋藤氏對於文學的態度，概括指出：「拙堂的文學主張，文評標準，和我國桐城派的標榜，大致相同。他所尊崇的道統，載道的古文，正符合日本封建統治階級的要求，也如清代桐城派為清朝統治階級所極力倡導，同一道理。」²⁰一言以蔽之，即肯定文章經世致用之價值。正是齋藤氏抱持著「文章本以明道紀事，又必輔以法度文采，而後可傳」²¹之態度，其對於小說作品或小

¹⁶ 伊東祐相，字寵卿、龍卿，通稱彥松、修理，號李門。生於文化九年，卒於明治七年。文化十二年（1815）襲封日向飢肥藩主，天保二年（1831）建藩校振德堂，並舉用儒者安井滄州（1767-1835）、安井息軒（1799-1876）父子二人為教授。兼善書畫詩歌。相關生平軼事，參酌市古貞次等編：《国書人名辞典（第一卷）》（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頁160。

¹⁷ 楓江釣人：《海外新話》，京都：嶺田氏藏版，嘉永己酉年（1849）刊本，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¹⁸ 渡辺守邦：〈海外新話一件始末—近代へのもう一つの可能性—〉，《言語と文芸》第76輯（1973年），頁173-174。

¹⁹ 除前已揭櫫增田涉《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外，尚具代表者，如有單篇論文森睦彦：〈海外新話の刊行事情〉，收入長沢先生古稀記念図書学論集刊行会：《図書学論集：長沢先生古稀記念》（東京：三省堂，1973年），頁541-565；渡辺守邦：〈海外新話一件始末—近代へのもう一つの可能性—〉，頁161-184；武内博：〈『海外新話』の著者嶺田楓江と英人閣斌士〉，《日本古書通信》第50卷第2號（1985年2月），頁5-7；岸本美緒：〈『夷匪犯境錄』の形成と流伝〉，《お茶の水史学》第61卷（2018年3月），頁73-110，以及專著如明石吉五郎著《嶺田楓江》、韓妍麗著《嶺田楓江の思想と行動—『海外新話』を中心に—》（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2016年）碩士學位論文，可資參酌。

²⁰ 黃軼球：〈漫談日本漢文學名著——《拙堂文話》〉，《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卷（1985年），頁66。

²¹ 拙堂先生著：《拙堂文話（續編）》（京都：出雲寺文次郎等，天保六年〔1835〕跋刊本，日本

說家，都有著異於時人之看法。他曾讚許儒者中井履軒（1732-1817）以左傳體改寫日本民間故事〈猿蟹合戰〉成漢文小說《俗云猿嶋復讎事》，以為「敘事簡老，學左氏而克肖焉，未可以游戲之作輕之」。²²又指出如中國戲曲家李漁（1610-1680），雖「好作雜劇，文亦有俳氣，我邦戲作一流之人耳。然余讀其《一家言》，間有可取者，亦不敢廢也。」²³可為一證。如果說，《海外異傳》的創作態度是奠基於實用文學觀，或許可以進一步追問：齋藤氏欲就漢文小說闡明何如之「道」？而此一道統又通過怎樣的敘事策略，化為作者筆下理想的英雄群像？此問題三也。

以下本文將藉由英雄海外建功之情節內容，及小說中「出航—討逆—歸返」之敘事結構，嘗試就齋藤氏透過創作來激揚幕末志士團結抵禦外侮的理念，加以探究。

二、出航：發跡於市井的英雄

自古以來，任何一位偉大的民族英雄的誕生，大凡在一套特定的歷史語境下為敘事者所召喚，從來就不是因為英雄自身知其為英雄，故能為凡俗所不能為之事。成立於日本中世紀的軍談物語《太平記》（1370），文中所述南北朝戰神楠木正成（?-1336）從一介地方豪強庶孽，轉身成為智勇雙全、忠君愛國之民族英雄，乃至為近世文人講家傳頌不輟，武家子弟舉為理想政治之實踐者，便是極好證明。²⁴受時代環境影響使然，浸於史、諳於文的齋藤氏一如多數的幕末藩士，特別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卷1，頁1上下。

²² 拙堂先生著：《拙堂文話（正編）》，卷7，頁11下。

²³ 同前註，卷2，頁12上。

²⁴ 楠木正成史稱大楠公，係鎌倉幕末迄南北朝初期著名武將，素有日本戰神之名。相傳其為橘諸兄後裔，世居河內金剛山麓，早年聚為地方勢力。元弘元年（1331），後醍醐帝密謀倒幕失敗，逃往笠置山，欲號召四方豪強共成復興志業，未果。時正成率族謁帝，欲響應勤王之舉；翌年，於赤坂城、千早城舉兵抗暴，成功擊退關東幕府。據《太平記》載，正成驍勇善戰，足智多謀而善游擊，雖兵微將寡，輒能以出奇不意之戰略制敵。及建武中興（1334）以還，後醍醐帝行獨裁專制、分賞不均；重以政策失當，朝令夕改，民生怨沸，武家不平，遂又爆發中先代之亂（1335）與足利尊氏之反叛。正成既知民心叛離、國運維艱，仍一無反顧，起兵討伐，忠君護國心切，不言而喻。爾後，正成上奏遷都之計，不為帝用；於是知大勢將去，惟有背水一戰。最後湊川之戰，皇軍潰敗，正成與弟交相刺死，其遺言曰：「惟願一

推美楠木氏族，以為「皇國君臣之義冠於萬邦，而楠中將一門為其稱首。父死而子繼之，子死而孫繼之。至雲仍昆來，終不改敵愾之志，殲其種族而止。雖皇國多忠義之門，蓋有一而無二，漪戲盛哉。」²⁵尤其屢次在詩文中褒揚楠木正成之行誼，如云：「數百年來，天下之為忠為孝，為豪傑英雄，為大賢君子者，一歸楠公。公一出焉而天地立矣，日月明矣。」²⁶如頌：「世推智勇，千古英雄。士化純德，一門精忠。」²⁷將其視為集日本古今忠臣義士、俊雄豪傑與賢才智者等良善形象於一身的英雄典範。²⁸

從而，當齋藤氏滿懷「史筆凜然吐生氣，揭將三傳警恬嬉」²⁹之豪情壯志，欲為近世人物山田長政、濱田彌兵衛與鄭成功共譜一段歷史傳說時，一併將自身對於楠木正成的英雄想像投射其中。儘管現實中三傳人物出身卑微，而載諸史冊的鄭成功，「不惟挾冊之士能道其事，即婦人小子亦知國姓爺」，³⁰事實上其與日本之關係又遠不及中國，絲毫無礙於作者對其形象之詮釋與重構。³¹

生殺敵，七生報國。」迨江戶偃武以還，有林羅山、朱舜水、安東省菴等碩儒，先後為正成撰作漢文傳記、贊詞，用以表彰其忠節之一面，甚有將之與中國諸葛孔明相提併論。又，伴隨著《太平記》相關注疏研究魚貫面世，楠木正成之英雄形象及其過人之軍事戰略，再次被凸顯與放大。時有著名漢儒岡島冠山（1674-1728）做「演義體」，敷陳《太平記》故實而為漢文小說《太平記演義》（1719）。迄江戶末期，訴諸尊王攘夷之志士蜂湧崛起，而詠楠公之漢詩亦紛呈踵現。

²⁵ 齋藤正謙：〈楠木誌序〉，《拙堂文集》，卷3，頁13下。

²⁶ 齋藤正謙：〈題楠中將畫像〉，《拙堂文集》，卷6，頁21上。

²⁷ 齋藤正謙：〈南木祠碑陰記〉，《拙堂文集》，卷1，頁54上。

²⁸ 齋藤氏不僅將楠木正成推尊為日本亂世忠臣之代表，甚至認為比起中國歷朝之賢能，絲毫不遜色。〈湊川碑〉云：「老枝向南宰上樹，靈鰲巋然貞珉古。萬口爭傳碑面字，嗚呼忠臣楠子墓。楠子忠孝真絕倫，高懸姓名著乾坤。一死報主意未足，更留丹心貽子孫。有明徵士朱舜水，眼見崇貞事迹似。潼關守失傳庭亡，松山覆軍象昇死。北京宰執盡奸回，南渡君臣仍樂災。何堪虎狼相踵至，翻然一舉蹈海來。慕賢何問海內外，日域自有楠子在。三百年後贊英風，字字血淚寄感慨。西山黃門忻得之，勒之碑背示千祺。為有忠孝卓千古，此文亦入人肺脾。君不見東西三萬里，上下兩千年，山有富嶽表海東，樹有櫻花薰東天，人中更有楠子美，西方美人誰得比！」氏撰，吳鴻春輯校：《鐵研齋詩存》（東京：汲古書院，2001年），卷4，頁83。

²⁹ 李門祐相撰：〈讀海外異傳〉，收入齊藤德藏著：《海外異傳（全）》，序頁2上。

³⁰ 三山谷：《海外異傳商榷》卷之上，奈良縣高市郡教育會：《三山谷先生遺稿》，頁282。

³¹ 齋藤氏〈讀《鄭成功傳》〉云：「日出日沒將無同，鄭家靈種出日東。可知大木即楠木，三世

首先，齋藤氏將古代英雄的概念從少眾精英之手中解放，取而代之，是一種出於現實政治考量，以養才為目的、教化為手段，以俾為幕府政權服務的英雄。換言之，他認為英雄之於幕末時期而言，不再是《日本書紀》或《古事記》所謳歌，介於人神之間、充滿著神話色彩的神明英雄，如倭武天皇、神功皇后者流；又或中世以來頻繁出現在軍談物語、讀本中，一群被刻意被誇大渲染、「屈一人下，伸萬人上」的帝王英雄，如北条宗政、豐臣秀吉者流。而是如武臣楠木正成「以簪纓換介冑，雪列之辱，而洩烈士之憤」；「雖其業不終，而一旦克復之功，可以跨周宣王，而侔漢光武」之偉烈。³²英雄的粉墨登場，如「忠臣義士之出，譬如麟鳳之瑞，宜人人欲識其所出也」。³³其未必出身貴冑，卻能喚醒世俗貴賤，使人人自覺地仰慕英雄之人格風致。或謂：「英雄之所定天下者四焉，曰智曰勇曰識曰量，四者不可闕一，而識量為之最。苟無識量，雖尤智大勇，竟無所施。」³⁴所謂識，即識鑑、高瞻遠矚也，在智曰見識，在勇而曰膽識，在量曰識器；量，即器度、有容乃大也，所以忍其小以成就大業，故云識量為最。唯有具備上述特質者可謂真英雄；否則，雖身懷智勇，亦不過是紙上談兵之腐儒庸生，³⁵或有勇無謀之莽夫鄙人而已。如此，齋藤氏援草澤英雄作為書寫對象，理由不言而喻。

為賦予草莽英雄發跡之合理性，並就其特出的人格氣度進行鋪陳，齋藤氏在營構三傳人物之際，採取史家慣常「隱惡揚善」的敘事策略，美化其年少與成長過程。如云山田長政「少而礪落有大志，不事商販作業，好譚兵，雄傑自喜」；濱田彌兵衛「勇而有謀」，與其弟、其子「並有膽略，力兼數人」；又或鄭成功「倬儻有大志」、「讀書穎敏」等，種種英雄之所以為英雄，其年少早慧，膽識過人、胸懷鴻鵠之志的人格特質，躍然紙上，並為出航埋下伏筆。與此同時，卻意圖遮蔽山田長政好勇的結果，是失之鬥狠，因「好談兵學劍，嘗與人鬪，殺數人，恐一旦事露及干禍也」³⁶，方有「大丈夫當跋越殊域，以圖功名，安能區區久屈辱於市井間」³⁷的人生之慨。而濱田彌兵衛為長崎官代末次平藏出兵台灣的背

無枝撼北風。」收入《鐵研齋詩存》，卷10，頁261。

³² 齋藤正謙：〈南木祠碑陰記〉，《拙堂文集》，卷1，頁53下。

³³ 齋藤正謙：〈南木祠碑陰記〉，《拙堂文集》，卷1，頁53上。

³⁴ 齋藤正謙：〈上杉謙信論〉，《拙堂文集》，卷4，頁15下。

³⁵ 齋藤正謙：〈蘭相如完璧論〉，《拙堂文集》，卷4，頁9上下。

³⁶ 故關口隆正：〈山田長政本伝〉，《山田長政資料集成》，頁32。

³⁷ 故關口隆正：〈山田長政本伝〉，《山田長政資料集成》，頁32。

後，原來存在德川幕府欲接續自豐臣秀吉以來，企圖侵略台灣未果的南進政策的野心。³⁸這些為作者所遺落在文本外的歷史事實，將一群失意、被迫出走的底層人物出落得洋洋灑灑，並順理成章成為一代之英雄；而載浮載沉的汪洋大海，亦成為其展現雄心壯志的競技擂台。

此外，齋藤氏對於傳主的心理狀態同時進行不同程度的想像與補白，試圖勾勒出這群英雄高度的民族意識與忠君精神。如鄭成功七歲隨父鄭芝龍（1604-1661）歸明、離開平戶終生未歸，自詡為明臣，並將畢生精力全數奉獻於反清復明的志業，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儘管如此，作者仍企圖通過「血緣」關係，將其與「原鄉」緊密連繫：

鄭成功初名森，字大木，明平國公芝龍之子也。母田川氏，我肥前國平戶士人之女。初芝龍流落，來客于平戶，稱老一官，娶田川氏。寬永元年，生成功於島中。島中萬火齊明，芝龍異之。成功七歲，從父歸明……年十五，補弟子員，試高等。風儀整秀，倣儻有大志。讀書穎敏，不治章句。有術士視之驚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命世之才也。」³⁹

上述文字中，明則寫一名英雄誕生的種種不凡，如出生時分天見異象（島中萬火齊明）、相貌奇偉（風儀整秀、骨相非凡）、夙慧有志等，暗則說明這些與生俱來的風儀器度，實來自「我肥前國平戶士人之女」田川氏。並且，因著這層與日本血脈相連的關係，為鄭成功一生當中兩次至為關鍵的出航，產生深遠意義：一次是七歲時從父歸明，一次則在明永曆十五年，自金陵敗喪後遷軍台灣圖謀復國。前次的出航，象徵身分之轉移，即由日本人的身分歸化為明人身分。此次身分的轉移，對於鄭成功而言是被動的。七歲以前的他，與母田川氏生活於平戶，而後隨著身為海盜的父親——一名身分始終流動、沒有家國意識的化外之民，同附屬於明朝政權。在《海外異傳》中，齋藤氏對於鄭芝龍的描寫，多著意於其天性見利忘義、攀炎附勢的醜惡舉止，並為之深惡痛絕。最鮮明的例子，便是文中屢以成功之「精忠」反襯芝龍之「不忠」。譬如南明政權賜號鄭芝龍為「平國公」，

³⁸ 詳參竹內尉著：〈濱田彌兵衛と台灣事件〉，《海とその先驅者》（東京：健文社，1974年），頁248-226。

³⁹ 齋藤德藏著：《海外異傳（全）》，頁1上下。

鄭成功「封忠孝伯，恩寵日隆」；然而鄭成功從此感激欲圖報效，鄭芝龍卻是稍專權、懷異志，「與清人通聲問」。當清兵至安海，大肆淫掠之際，母田川氏亦不得幸免於難，於是投河自盡。如此節烈犧牲，即便是身經百戰的兵卒亦嘆：「婦女尚能爾，倭人勇決不負所聞也。」田川氏的貞烈行止，對於鄭成功同樣產生潛移默化之效果，當「清將挾芝龍而北，作書招成功。成功不至。」乃至「清主屢諭芝龍，作書招撫，誘以高爵。成功不從。」毫無疑問地，鄭成功的耿直忠誠體現大勇精神，而此一精神不僅傳承自身為日本母親之血脈（與生俱來的稟性），更凸顯他之所以與身為中國人的父親如此不同，全因「倭人勇決」之故。⁴⁰

至於第二次的出航，則體現在鄭成功自主地從南明政權與滿清政權間，毅然選擇不貳臣的明遺民身分。這樣的身分讓他在整個航海的旅途中，懷抱不是慷慨赴義的悲壯情志，抑或冒險犯難的進取精神，而是一種絕後重生的希望。因此，當敗北的鄭成功聽見紅毛通事建議收復台灣以為中興根據地時，喜出望外，旋即率兵前往鹿耳門。如進一步就鄭成功故事的內在敘事結構看，顯然齋藤氏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以為「當今世風衰薺，職無氣節之由」，⁴¹雖有良主如孝明，卻無英雄、兵卒如楠木氏之流亞，從而在提出「兼修文武，效治亂之用」⁴²之餘，更強調氣節之重要性，即大難當前、臨陣不肯脫逃的大無畏精神，或云：

蓋兵以人為本，以器為末，而人人能見大敵弗懼，有寸進而無尺退，投之水火而不避。兵必如此，而後可言器械之利，是在於平日教養鼓舞何如也。

⁴⁰ 誠如江仁傑指出：「中國明清之際的變局，迫使中國從禮儀之邦變成了韃虜夷狄之國，因此，具有忠義美德的英雄鄭成功，在當時日本人的眼中，顯然更不像是傳統上值得欽佩的『唐人』了。於是，『神國精神的感育』、『日本母親之血緣與胎教』以及『中國／中國父親的沉淪』這三個因素，共同形成了江戶時期日本人心目中的鄭成功形象。到了十九世紀後半的明治維新，日本式的鄭成功形象，成為帝國主義對外擴張時的精神資產。」參酌氏著：《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台北：三民書局，2006年），頁56。應被提及的是，齋藤氏此一敘事手法先是出現在山田長政之傳文中，長政之女阿因其母為暹羅國王女，當父親死於國王之妃以及與其姦亂的近臣之手後，親將兵卒以復父讎，展現巾幗氣節，頗有乃父風範。儘管阿因生長於南蠻（四夷），也未曾受過真正的日本文化陶冶，而其父少時尤其不屑儒者文士之業，更難以發揮文明教養作用，然而正是有著與日本血脈的這層關聯，注定阿因之人格思想終不可能與暹羅王妃相類。

⁴¹ 齋藤正謙：〈答牧信侯論道德氣節書〉，《拙堂文集》，卷2，頁28下。

⁴² 齋藤正謙：〈國校學則跋〉，《拙堂文集》，卷6，頁34上。

彼明清之衰，烏能如此耶！如明季之事詳載史乘，姑舍之。傳聞清氏近日之事，以募兵少應者，驅市人赴戰，見賊輒走。加之朝亦屢變，朝所任夕貶之，夕所進朝退之。林則徐與琦善伊里布二人，交迭升黜，戰之與和，竟無定局。其於大臣如此，況其他乎！是其所以受醜虜之侮也。然此外國衰世之形勢，不須為盛世陳列焉。臣職督文武學政，區區寸衷，偶論及之，不免杞人過慮，姑并記之，以為後世鑑戒。⁴³

上述之語，包含著對晚清國勢傾頹的觀看與對自我之反省。弘化二年（1845），任職於津藩的齋藤氏，曾在藩主的應允之下主導國內洋式大砲的鑄造工程，並在兩年後（1847）於藩中首度演放，上述引文所記，便是其當次觀砲後上繳藩主的紀錄文字。儘管齋藤氏向上宣稱「外國衰世之形勢，不須為盛世陳列」，且保守而謹慎的提出此番言論不過是「偶論及之，不免杞人過慮」，然而字裡行間不時透露出對清廷戰敗後，日本處於唇亡齒寒、不圖自強之患的堪慮。齋藤氏將清廷之戰敗歸咎於平日缺乏「教養鼓舞」、朝夕令改之故，如此一來，官民宛若一盤散沙，不能齊力抗侮，一旦見之小我、小利，便棄大我、大義於不顧。這些在現實中被清廷招募、見賊輒走的市人，成為小說中鄭芝龍形象之原型。《海外異傳》對於鄭芝龍貪生、貪權且眷戀於富貴的人格採取深描手法，意在凸顯鄭成功為公忘私、犧牲大我的英雄本色。如鄭芝龍先是因海上有暴利，自中國而去平戶，復因南明政權招撫有富貴可圖，於是歸來；當清軍大舉南進福州時，他不假思索選擇「退屯安海，為清廷所誘，欲降附」，縱使其麾下「諸將不從，成功痛哭而諫」，仍不為所動，「單騎往降」；無怪乎當清兵欲以之要脅鄭成功時，鄭芝龍竟口出「兒不至北朝其疲於奔命乎」之語。齋藤氏感慨如斯：「鄭大木慷慨唱義，招顏日於虞淵，以孤兵當勃興之敵，百折不撓，有我楠中將之風。及其子孫，奉正統於一隅數十年，亦與楠氏相類矣。蓋孕我東方之精故歟。」⁴⁴正是天性使然，促成三傳人物將建功立業的目光投向海外。

迥異於遭逢亂世、常作平定天下之思的鄭成功，躬逢太平盛世的山田長政與濱田彌兵衛，則通過洞燭先機之「識」掌握天下之「勢」（時勢、局勢），從而

⁴³ 齋藤正謙：〈觀演放天砲記〉，《拙堂文集》，卷2，頁17下-18上。

⁴⁴ 齋藤德藏著：《海外異傳（全）》，頁13下。

成就志業，即所謂「英雄眼孔自有所見，異於措大，他人不得預知也。」⁴⁵小說提及元和偃武以後，武士再無用武餘地，於是紛紛投身仕宦一途，欲求取爵祿，而山田長政卻以「此間無立功名處，唯游海外，或可以展吾志」，且「時下海無禁」為由，私匿瀧氏、太田氏二位海商之船隻前往台灣。爾後，抵達台灣，「長正通覽地方，蕞爾一島，且已有主，不可有為也」，則展現出其不欲反客為主、行霸權之道的一面，遂當機立斷再附蠻船西游，前往時值「邦內騷亂，四鄰交侵」的暹羅國，希冀有所作為。方是時：

暹羅國主出師禦之，長正（政）見其行軍無紀，私言其必敗，既而果然。人或傳其語，聞於國主；國主奇之，召見長正，詢方畧。長正指畫陳策，鑿鑿可用，國主大喜，擢長正為大將軍，往禦六昆。⁴⁶

相對於《暹羅物語》中對長政所以能「指畫陳策，鑿鑿可用」，是源於「悉覽日本軍法古戰物語，盡通中華記錄經書」而迸發特出的軍事才智的描述，⁴⁷齋藤氏直以上述事件具體呈現其「雄傑自喜」的性格，才是他能在人主前泰若自如、言之鑿鑿的關鍵因素：先是因觀暹羅國主所率一行兵卒「行軍無紀」，由是一語中的暹羅出師必敗於六昆的結局，凸顯長政見微知著、識見明敏的一面。爾後，有好事之徒偶然聽聞長政一番刻意經營卻不著痕跡的「私言」，於是復將此事傳之千里，使上位者聞而「奇之」，進而主動召見問政，反映他善謀投機、運籌帷幄的一面。最終，長政反客為主、化被動為主動，得以順利面聖獻計，並被國主擢拔為大將軍，「往禦六昆」。

如果說，山田長政的出航，為自己開創一片英雄造時勢的局面，那麼，稍晚於其時代的濱田彌兵衛，則是時勢造英雄的最佳寫照。與山田長政南向台灣希冀有所做為，或鄭成功東進台灣、以待反清復明的兩種時節因緣不同，齋藤氏在為濱田彌兵衛立傳之前，首先以較長的篇幅交代近世時期台灣錯綜複雜的歷史進程，有意為其在台以暴抵制荷蘭人的合理性與必然性，提出說明：

⁴⁵ 齋藤正謙：〈蘭相如完璧論〉，《拙堂文集》，卷4，頁9下。

⁴⁶ 齋藤德藏著：《海外異傳（全）》，頁2下。

⁴⁷ 關名、曲亭馬琴舊藏識：《暹羅紀事》（寫本年代不詳，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無頁碼。

先是，紅毛夷酋給日本甲螺，奪臺灣據之，剽掠我商船。當時有濱田某，脅紅毛夷酋而報之。臺灣在支那東南海中，古無聞焉。明天啟初，海澄人顏振泉聚眾據之，招我邦邊民入其黨，因自稱日本甲螺。甲螺猶謂頭目；我日本謂頭目為「加志良」，音近「甲螺」，故遂訛稱耳。先是，泉州人鄭芝龍，少流落，往來我邦，因入振泉之黨。及振泉死，眾推芝龍為甲螺，雄視海上。後受明將之撫，去移閩中，我邊民代之為甲螺。而紅毛夷來借地，約歲輸鹿皮三萬。既而築城郭據之，役使土人如奴隸，不復輸幣。且我商船往印度者過其近海，為被殺掠，甲螺不能如之何。適本邦商人濱田某至，眾交訴之，圖報復。某許之……乃與甲螺之黨二十人還，請之大府。大府允之，檄長崎代官末次平藏備船募卒，附之於彌兵。⁴⁸

首先，抵禦荷蘭人對日本人海外的侵犯，構成濱田彌兵衛出航之遠由。文中所云「紅毛夷」相對於「華夏」而言，暗含作者對漢文化傳統的認同，並對荷蘭人來臺時期種種行徑，進行道德性批判，包括：（一）、從以「約歲輸鹿皮三萬」借台灣之地，到「築城郭據之，役使土人如奴隸，不復輸幣」，是直指其不義、寡仁而無信；（二）、在荷蘭人侵占台灣前，日本邊民早已同中國海盜結黨聚於此，並形成一方之霸，逮其入台以後，非但未與當地住民、日本甲螺平和共處，對於前往印度的日本商船行經台灣時，更無故殺掠，則是不智、非禮。因此，當濱田彌兵衛南至台灣進行貿易，日本甲螺「名正言順」的向其請願，欲採取報復手段。而「某許之」，寥寥數字概括濱田彌兵衛勇敢果斷的形象。其次，儘管濱田彌兵衛有意為甲螺平反，但日本時值鎖國，苟無官方應允，仍不可為之。文中，濱田彌兵衛攜其黨羽返回江戶，向將軍陳情，「大府允之，檄長崎代官末次平藏備船募卒」，說明濱田彌兵衛不僅是在幕府許可下展開海外行動，並且得到來自官方的兵力、軍船，不僅為此次的出航提供雙重保證，同時也暗含著代幕府發聲，向荷蘭人表示國家主權而出航的意圖，於是構成出航之近因。

齋藤氏筆下的英雄，擁有高尚的氣節（東方之精），並具備完整的教養（智勇識量），儘管其發跡於分崩離析的天下，然行止必也合乎統治階層建構下，世界秩序中所體現的王道。換言之，幕末的英雄不必是成為雄霸一代之人主，但必然是能夠成就人主完成霸業的一世賢才。

⁴⁸ 齋藤德藏著：《海外異傳（全）》，頁5上-6上。

三、討逆：角逐於海上的英雄

十九世紀中期，當西方世界內部正苦於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各種反作用力時，與齋藤正謙同時代的英國文壇巨擘 Thomas Carlyle (1795-1881)，自過去歷史發展軌跡中歸結出一套特殊的英雄史觀，試圖回應時代之變革。他以為，「世界歷史就是人類在這個世界上所取得的種種成就的歷史，實質上也就是在世界上活動的偉人的歷史」，⁴⁹甚至指出「整個世界歷史的精華，就是偉人的歷史」，⁵⁰然而在現實亂世中，「要尋找一位能人，卻又不知道從什麼途徑著手，確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這正是我們這些時代中，世人所處的困境。我們的時代，是革命的時代；而且為時已久。」⁵¹顯然，在 Thomas Carlyle 的心目中，唯有少數的政治菁英得以於亂世振衰起敝、率眾實現理想社會秩序。這種對「人治」的期待，不僅映現西方社會中的英雄崇拜文化，並且成為觀看一代社會歷史之縮影。

與此同時，作為文人幕僚之一的齋藤氏同樣建構屬於東洋英雄的歷史，投射出十九世紀日本知識分子在面臨時代新舊交替下，產生的矛盾衝突與時代焦慮。《海外異傳》出版後三年的嘉永六年（1853），美國特使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 乘艦前來要求開國，結束幕府長達 250 年的鎖國時代。而此一事件最終導致德川慶喜（1837-1913）大政奉還（1867），宣告幕府時代壽終正寢，這是齋藤氏所始料未及。

儘管早在天明六年（1786），著名的蘭學者林子平（1738-1798）於《海國兵談》中率先提出以海軍為主體的海防理論，⁵²然當時幕府卻把其視為異端邪說而加

⁴⁹ 托馬斯·卡萊爾 (Thomas Carlyle) 著、周祖達譯：《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業績》（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1。

⁵⁰ 同前註，頁 1。

⁵¹ 同註 46，頁 224。

⁵² 林子平曾於〈海國兵談序〉中指出：「夫海國者，環國四周皆海也。海國不可無相應之武備，然則本邦古今之兵家，竟未有一論及抵禦海寇之事。是無禦海寇之武備，要非本邦之武備。蓋外寇入侵，有難易二義，苟其軍艦得順風之行，一日可越洋二、三百里，此所以言易；又，我邦之四方以海岸為險要，孟浪難襲，故言其難也。是以本邦禦寇，以海防戰略為當務之急。其術唯水戰耳，而水戰之要在於大砲，此乃海防之真理也。此或異於漢土、韃靼等陸國戰備。明水戰然後言及陸軍之事，如大江匡房、楠正成甲越二子等，僅知漢流武備，似未及海國之議，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此書以水戰居之卷首，以其乃海國武備根本之故。復知其又與漢土蠻夷古今地勢人情不同。」見氏著：《精校海國兵談》（江戶：大和屋喜兵衛，安政三

以禁錮。逮鴉片戰爭爆發後，幕府雖認清鎖國海防的侷限性，但對於如嶺田氏《海外新話》中所鼓吹鑄造巨型洋艦的海防言論，仍以有違祖制強加禁毀。面臨世界時局之轉變，齋藤氏一方面肯定幕府繼續維持鎖國外交之傳統，另一方面，對於西方知識文明東漸，秉持積極學習的態度，頗見知己知彼、以求百戰不殆之雄心壯志。齋藤氏首先肯定西學關於器物技術先進之一面，輒有「它山之石，可以攻錯」之嘆；如嘗摹倣洋畫中的城郭圖，作為教授國內築城技藝之資；⁵³讚美「地理學問以西洋之說為精博」，⁵⁴以為丈量技術實「歐羅人於事精細，非東洋人所及也。」⁵⁵云云。

在提出西學為用的同時，齋藤氏更措意於日本的主體性與殊異性，指出「國勢有東西之異，人情有古今之殊」，⁵⁶需因時地制宜，截長補短。職是之故，當國內新舊二派知識分子正為是否應放棄舊制、造巨艦一事而爭論不休時，齋藤氏明確提出自己反對的理由：

近歲海寇出沒，所乘之船皆堅牢壯大，儼如城郭，於是策海防者，多欲倣彼製造巨艦敵之，其計允當矣。然今欲備巨艦，造之無匠、操之無卒，加之用度不貲，不可遽辦，非待數十年之後則不可矣。今欲防目前之寇，而恃數十年後纔成之舟艦，恐敵不相待焉。且今所欲防者海寇耳，其戰非近岸則近嶋，如此艦亦足矣，顧用之何如耳！吳大帝以一走舸破黃祖兩蒙衝，明太祖以七小舟破陳友諒巨艦數百艘，小之克大，寡之勝眾，有如此者。且我藩有閑山故事，督勵將士，能使如當時，何必論戰船之大小哉？況如此艦亦不甚小乎！然則如蠻制巨艦，雖徐徐圖之可矣。⁵⁷

上述文字，說明事實有四：（一）、齋藤氏之所以認為幕府現階段不可「如蠻制巨艦」的關鍵因素，並非如保守派所主張舊制不可廢，意即自寬永十二年（1635）《武家諸法度》中明文規定「不許私造五百石以上的大船」一例，而是在於國內缺乏

年〔1856〕刊本，日本北海道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序頁1-2。

⁵³ 齋藤正謙：〈題西洋城郭圖〉，《拙堂文集》，卷6，頁27下。

⁵⁴ 齋藤正謙：〈地學啟蒙跋〉，《拙堂文集》，卷6，頁42上。

⁵⁵ 齋藤正謙：〈遭厄日本紀事跋〉，《拙堂文集》，卷6，頁40上。

⁵⁶ 齋藤正謙：〈正經界議〉，《拙堂文集》，卷6，頁55下。

⁵⁷ 齋藤正謙：〈海上試船銃記〉，《拙堂文集》，卷4，頁22上下。

相關建船工匠、駕船兵卒，且中央、地方財政均緊張，無法肩負養船經費之故。換言之，倘若國家擁有相應的人員、技術與財力，建造巨艦亦無不可，故云「雖徐徐圖之可矣」。(二)、齋藤氏提出以小船取代大艦之用，並非出於退而求其次的消極心態；相反的，他用中國歷史上東吳孫權一葦輕舟破蒙衝、明太祖七小舟擊退陳友諒巨艦，以及近世日韓閑山島海戰三件事實，說明以寡制眾、以小抗大這種戰略型態的可行性。(三)、面對海上侵略者之來勢洶洶，齋藤氏積極蒐集新知識、新事物外，更致力於考其真偽、辨其異同的工夫。他曾偶得蘭人支蒲兒所製地球圖，稱此圖「譯述不詳，傳寫多訛，但比之哥氏之圖，航海路多一線程，其他地形亦有小異同，未嘗無裨益也。」⁵⁸ (四)、又列舉近世以來堪為日本海防實力之表率之軍船七艘，包括龍翔丸、三國丸、九鬼氏盲船、車輪船、福州船、寧波船、無名軍艦，並逐一考校各船來源、特色及戰備歷史，而謂：「舟楫之用，軍國所必須，有古今之變、東西之異，講海防者不可不留心焉。」⁵⁹ 可以說，齋藤氏調和古今、東西的折衷觀點，構成其海防體系之核心價值。最後，應被提及的是，儘管鎖國時代的德川幕府也重視海防事務，但其重防輕攻的態度，又與西方的海防觀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幕府所強調的海防，既是出於對外防備海寇、洋艦之侵擾，尚有著對內防備沿海地帶進行走私貿易之一層需求。齋藤氏所謂「今所欲防者海寇耳，其戰非近岸則近嶋」，意正在斯。如此，海戰之成敗，自然也就與戰船之大小不相關切。

那麼，重防輕攻的短線海戰策略，應就何處下工夫？齋藤氏提出與西國船堅炮利長于「長程遠征」相反的「短兵交戰」，以為禦寇戰略：

余嘗閱蠻畫，偶得此兩軍交鬪圖，亦足以見西洋人戰鬥之狀……士卒皆著皮製，步操短刀，騎操短槍，皆以隻手相刺擊，無發揚蹈厲之狀。《明史》稱紅毛恃巨艦大礮，其人不善戰，蓋西人之武，大抵皆然……近世西虜益善銃炮，用之陸戰，刀槍殆廢，嚮見〈魯西亞戰伐圖〉。萬銃叢進，間以大礮，無一短兵，是捨其短而用其長，不可復侮焉。然使良將當之，亦必有應之之術矣，講兵者不可不預察也。⁶⁰

⁵⁸ 齋藤正謙：〈題支氏地球圖〉，《拙堂文集》，卷6，頁26上下。

⁵⁹ 齋藤正謙：〈題軍國諸船圖〉，《拙堂文集》，卷6，頁28下。

⁶⁰ 齋藤正謙：〈題番軍交鬪圖〉，《拙堂文集》，卷6，頁28上下。

此處齋藤氏進一步就自身對於西方軍事知識的理解，提出看法。首先，他通過洋軍交鬪圖以及過往史料文獻之閱讀經驗，發現洋人受限於本國地理環境、歷史文化經驗之囿，雖擅長遠距交戰策略、從而打造堅實的軍事武裝，然而對於短兵交戰的軍事方法，似是無所適從。引文中詳細描述關於洋人陸戰之場景：士兵皆身著鐵皮所製鎧甲應戰，若騎兵則操短槍，若步兵則操短刀，各司其職。然而一句「皆以隻手相刺擊，無發揚蹈厲之狀」，卻點出西洋陸軍因身著重裝難以發揮身體功能，且必須全權仰賴單一武器攻擊的重大缺點，此或遠不及東洋陸軍作戰所強調的輕快迅捷。其次，近世以來，西方諸國在陸軍戰備上紛紛投入銃砲製作，「刀槍殆廢」，捨短求長，幾乎可以說喪失短兵交戰的功能；一旦洋人來襲，於近海或沿海陸地與之交戰，東洋兵法技術自是遠勝西洋巨艦大砲一籌。⁶¹

如果明白齋藤氏這層軍事思想，便不難理解何以其欲通過歷史事件（傳統武備書寫）來發明海外戰鬥現場，而非「新聞」。在《海外異傳》所描繪各種討逆戰爭過程中，可以發現類近於《太平記》書寫戰事的敘事基調。譬如當長政受國王擢拔為上將、往禦六昆時，其所採取制敵方法便是楠氏夙負盛名的游擊戰略：

時邦人流寓暹羅者眾，長正糾合數百人，雜以土兵，亡慮萬餘人，皆為日本裝，聲言日本援兵大至。六昆軍沮，因縱兵奮擊，大破之。六昆王憤甚，傾國來寇，兵數十萬。長正曰：「敵眾強盛，難與爭鋒，唯以謀撓之，破之易易耳。」乃分為三：一伏山陰，一艤海滙，長正率親其一，出於海陸之間，進挑戰。兵既交，佯敗走。六昆兵追之。將及，號砲俄發，海陸兩

⁶¹ 應被提及的是，在《海外異傳》中儘管濱田氏是唯一一位以日本刀制敵的角色，受限於情節安排，齋藤氏選擇淡化處理，不過在〈濱田氏護身刀歌，為長崎曾乾堂〉中，可以看見其於日本刀的特殊情感：「赤崁城郭映碧瀾，峨艦大炮擁海門。紅毛夷賊來盤據，宛如長蛇當途蟠。掠我船舶奪我貨，逐我甲螺置蠻官。兇威汹汹震海島，商旅盡嘆行路難。鎮西勇士濱田氏，慨然上稟雪國恥。我甲在心何借兵，親隨唯有弟與子。懷中匕首不盈尺，單舸泛洋入不測。何畏彼炮如巨鐘，一呼奮進靡眾敵。入穴擒虎如孤豚，手扼其吭拍其肩。拔刀擬之責其罪，汝何為者何敢然。蠻酋哀鳴乞饒命，重質倍償從指令。連艦如城貨如山，萬里歸報一府慶。君不聞劫齊刺秦同一情，荊卿不成曹沫成。不成猶可成更好，於沫有光濱田名。曾生寄示八寸鐵，當時劫虜此是物。匣裏虎眠二百年，使人見之猶震慄。嗚呼！日本刀，日本魂，今有其刀無其人。安得起□□□九泉下，往批橫海萬尺鱗。」《鐵研齋詩存》，卷9，頁222-223。

軍，吶喊齊進，火鎗亂發。長正視機反之，眾敵軍前後擊之，大破六昆兵，殺數萬人。遂追北長驅入其都，擒六昆王以歸，威震遠近。⁶²

一方面，山田長政掌握兵法所謂「兵不厭詐」之特性，先是糾合寓居暹羅的日本人與土人喬裝日本兵，向外聲稱日本援軍來朝、欲滅敵人之威風；爾後，與敵軍正面交鋒於海陸相間之地帶，主動迎戰的山田長政卻又「佯敗走」，試圖誘使原居於海上的敵寇轉向陸路，並引入事先設下的陷阱中，扭轉整場戰局之主導權。另一方面，當六昆軍進入山田長政佈下的軍陣圖後，包括在海邊戒備與山間埋伏的二路人馬，隨信號出現，「吶喊齊進，火鎗亂發」，而山田長正率領之隊伍則是與之分立三面，伺機夾攻。最終，大破敵軍，擒王而返。通過緊湊明快的短述句，以及帶有迅速義的文字鋪排，如敗走、追之、俄發、亂發、長驅等，不僅凸顯游擊戰主動出擊的一面，同時將其靈活流動、速戰速決之特性發揮淋漓。

此外，如從〈暹羅軍艦圖〉看此次戰役，則可見出該次戰鬥現場中，被齋藤氏淡化處理的海防武備原貌何如。齋藤氏曾為此圖題記，如是云：

有客出一圖，披而覽之：其大亘一席，中有一大鬪艦，破海濤而進。將士皆著日本裝、執日本兵器。而艦如西洋之制，檣桅四竿，發煩十八門，排列左右。上書賽神之意，款曰「寬永三年丙寅二月當國生，今天竺暹羅國住居山田人左衛門尉長政」。其原圖製為扁，在駿府淺間廟，此其摹本云。按長政駿府市民，元和中出游暹羅，會其國亂，因為其將，有戰功，封一王國。至是命工造此扁附商舶，獻之宗社告其成功。其智勇功業，比之鄭延平不多讓焉，亦足以揚我皇國之威於異域，豈不偉歟！余嘗獲《暹羅物語》等書，詳其事蹟，今又收此圖，足以相證焉。且長政用我之兵器，駕彼之軍艦，東西長技，兼而施之，可以為法。講海防者，其或有攷於此矣。⁶³

從文中可知，山田長政在六昆之戰中，並非全採游擊戰作為制敵辦法，至少在海線一方，尚使用「如西洋之制」完成的軍艦禦敵，可謂完美演繹「東西長技，兼而施之」的近代海防策略。儘管齋藤氏並未言明在該次戰役中，山田長政是如何

⁶² 齋藤德藏著：《海外異傳（全）》，頁2下-3上。

⁶³ 齋藤正謙：〈題暹羅軍艦圖〉，《拙堂文集》，卷6，頁64下-65上。

運用該軍艦，不過顯然是因暹羅國素來長於海戰、且有相應軍力資源之故，洋式軍艦得以發揮功效。

頗堪玩味的是，齋藤氏曾就中國、日本與西洋三國舟船之優劣進行比較後，得出：「倭船不若福船，《紀效新書》言之；福船不若廣船，《三才圖會》言之；福船、廣船又迥不及蠻船，人人言之。由是觀之，我船不獨不敵蠻船，比之唐山諸國，亦不及焉。」⁶⁴並由是證明豐臣秀吉征韓之戰的取敗之因，在於「陸軍所向無前，至於水軍屢取敗衄」。⁶⁵縱使舟船水軍不如他國，齋藤氏依然深信日本傳統陸軍之精實、整齊劃一，實無人能出其右。除小說記山田長政使日本僑民、土人喬裝日本軍以滅敵軍之威風，又或題畫文字所指出，其率領的陸軍「將士皆著日本裝、執日本兵器」之外，事實上，在濱田彌兵衛的傳記中，猶可見作者刻意通過小說人物之口，以展現日本陸軍勝於洋人一籌的優越感：

彌兵盡裝其從兵數百為農丁，被蓑笠、持鋤鏝，行到臺灣海口，請於守吏曰：「日本之氓，聞臺灣土廣人寡，中多萊蕪，欲移住以開墾之」。守吏以告甲必丹，弗信；以哨船圍之數重，不遽許上陸。使人來言曰：「汝之來，決非好意；不然，何從人之眾也」？彌兵曰：「唉！公何疑人之甚耶！假使日本欲略海外之國，當遣猛將精兵來，日本素不乏其人，奚使我儕小民之為？」守吏檢舟中，僅有數十副防身刀，其他唯有耕耨之具而已；還，備告甲必丹。甲必丹意稍解，乃許眾登陸。⁶⁶

迥異於山田長政令手無寸鐵的百姓喬裝兵卒，以壯大軍容之假象，濱田彌兵衛則使從兵數百人偽裝為來台墾拓之尋常野夫，欲消解守吏之戒備心態。通過二人應答的過程，一者凸顯濱田彌兵衛以率領日本精兵抗荷而感到自豪的心態，頗有勢在必得之意味；再者，亦反映當時甲必丹對日本軍隊高度防範的警戒狀態，包括當日本船靠近乞求登陸時，蘭人動輒「以哨船圍之數重，不遽許上陸」，又或承認濱田彌兵衛所謂日本素能培養猛將精兵的事實，即便是擁有船堅砲利的荷蘭人，亦要敬畏三分。而此又與《崎陽先民傳》中所描述濱田彌兵衛奉旨出航前，懷抱

⁶⁴ 齋藤正謙：〈海上試船銃記〉，《拙堂文集》，卷2，頁21下-22上。

⁶⁵ 同前註。

⁶⁶ 齋藤德藏著：《海外異傳（全）》，頁6上下。

慷慨就義之決心，以及領兵卒七百、武裝整備而聲勢浩盪之戲劇化場面，⁶⁷截然不同。

凡此，或隱然傳遞出齋藤氏希冀通過對小說情節的鋪陳與安排，以發揚現實中日本陸軍善於短兵交戰、活用陣法兵器的優良傳統，並以之完善近世海防的不足之處。

四、歸返：活躍於時代的英雄

如果「討逆」是英雄與生俱來勇悍不退的天命，那麼「歸返」便是英雄對於國族血脈相依的細膩柔情。它成為傳文中極其重要的書寫意象。齋藤正謙筆下的歸返，既象徵身形上的具體歸國，同時也是心靈上對固有傳統文化的回歸。《海外異傳》中，濱田彌兵衛以抗荷有功，獲「肥後侯聘而祿之」的結局係屬前者，可謂英雄故事類型裡典型的團圓喜劇。相對於此，山田長政晚年為國王之妃及其近臣毒害，客死暹羅，與鄭成功因緬酋叛變導致南明覆亡、抑鬱而終於台灣，則是各自演繹英雄在海上建功未遂的失敗結局。尤其，當齋藤氏續寫長政之女阿因為父復仇不成，戰死沙場；成功之子鄭經守成台灣，最終無望復國二事，為二人的命運再添一層命定的悲劇色彩。而通過他們忠誠愛國、英勇與好強不屈的人格特質，同時映現作者在現實政治道路上，欲尋求「歸返」的願景。

一方面，小說言及數年之後，當名震暹羅四鄰、坐享榮華的山田長政，再見昔日瀧氏、太田氏二位海商時，特意遣使迎勞入館，不僅「飲食供御，如待貴客」，並「厚賜遣之」；對於當年二人偶然協助出海一事，更是滿懷感恩，直陳：「予之有今日，實由二子之賜。抑人有德於我，可不報哉！」爾後，但凡有日本商船游於暹羅境內，竭盡所能善待來者。另一方面，山田長政受暹羅國王青睞，晉身諸侯爵位，領有封邑，更娶王女為妻，盡享富貴榮華，卻不曾忘卻自己作為日本臣民之身分，如言其「屢牒執政，納方物於幕府，不失恭順之意」；或言其每臨

⁶⁷ 《崎陽先民傳·任俠》中「濱田彌兵衛」條記載：「彌兵者素被茂房愛，有勇為之義，乃與其弟小左、子新藏偕屬茂房，同將崎土兵七百人，則載軍具芻糧，發船于崎港。其親戚朋友，相與謂彌兵曰：『吾子雅非食武事者，何為先眾也？強哉是行也。事成不足以為榮，事敗則暴骸於異域。與其任氣輕生，不如退而全身。』彌兵扼腕而答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大丈夫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吾不能為國雪恥，安敢入國也？』則勃然勵眾，艤以行。」《崎陽先民傳》，卷下，頁2下。

戰事而「遙禱於駿府淺間之神，軍輒勝。至是命工匠摹繪當時戰鬥之狀為匾」，使來航邦船往獻淺間廟以酬神等，可見一斑。⁶⁸這份對祖國的認同，對故鄉難以切割的情感，甚至在以山田長政為首的政權瓦解後，影響其麾下日籍兵卒去留暹羅國之決定：

頃之，國王殂，世子代立，長正退就封。先是，國主之妃與其近臣姦亂，謀除國主，畏長正而不發。及長正去，遂弑之。長正聞之，則謀興兵討之。二姦大懼，募人潛往毒之，長正死；時寬永十年也。長正無子，有一女名阿因，勇武有父風；親將其眾，欲復父讎，屢敗暹羅之兵。通國震恐，盡發屬國之兵來戰，眾寡不敵，阿因遂敗亡。其下逃歸於本邦。⁶⁹

山田長政為姦佞毒害身亡後，其女阿因率眾起兵討逆。阿因驍勇能戰，頗有乃父之風，以致奸賊聞其出兵之舉，竟「通國震恐，盡發屬國之兵來戰」。最終阿因寡不敵眾，敗亡於戰場，而僥倖存活的手下兵卒，則選擇逃往政局安定的日本。關於「其下逃歸於本邦」之說，未見載於史冊，唯小說《暹羅物語》記錄其事，據齋藤氏為該書題跋語：「《暹羅物語》二卷，延寶中長崎人木下某，從知（智）原宗因問山田長政遺事，以紀述之者也。宗因稱五郎八，從長政及其子阿因，於暹羅周旋兵間。老歸長崎，以壽終。」⁷⁰是知歸逃者智原宗因，以該次王政禍亂為契機，重返鄉里、壽終正寢。儘管此一結局讓人為山田長政客死異鄉的遭遇感到唏噓不已，然而這名崛起於亂世、復因亂世敗亡的英雄，雖不得生還家鄉，其英勇事蹟卻隨散逃者歸返家園，並且在後人口耳傳唱中得以再現。

江戶後期著名通俗文學家、藏書家曲亭馬琴（1840-1842）亦曾閱讀《暹羅物語》，並將山田長政事蹟與《水滸後傳》相附：「《水滸後傳》四十回雁宕山樵中有李俊至暹羅成為彼土之王一事，係據日本起兵救援暹羅事而作。按唐山亦有

⁶⁸ 淺間廟係供奉日本富士山神靈之神社，屬日本傳統山岳信仰之一。江戶時期以還，祭祀富士山靈、祈求願望，與夢想成真再報恩感謝之意的信仰內涵，廣泛被庶民階層所接受，並流行一時。詳見鈴木正崇：《山岳信仰》（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5年），頁132-160。

⁶⁹ 齋藤德藏著：《海外異傳（全）》，頁4下-5上。

⁷⁰ 齋藤正謙：〈暹羅物語跋〉，《拙堂文集》，卷6，頁40下-41上。別見齋藤正謙：《鐵研齋輶軒書目》（刊本出版地、年代不詳，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頁6下-7上。

傳聞山田仁左衛門事，《水滸後傳》欲撮合而造作之。」⁷¹如果說，《水滸後傳》的作者陳忱欲通過李俊故事的改寫，以訴諸在既有權力外另建立新秩序的渴望，⁷²那麼，齋藤氏便是藉其展現對於幕末政權重振天下、社會回歸傳統倫常之殷殷期盼。

另一方面，齋藤氏通過對鄭成功航返情節的鋪陳安排，則具體映現對南明政權、儒家傳統政教觀的認同與因循。《海外異傳》中言及三次鄭成功歸返明室的場景，伴隨著次次「出航—討逆—歸返」的旅程，不僅可以清楚看見主人翁堅定的歸返意志，而其忠君愛國的良臣形象亦隨之鮮明：（1）當鄭芝龍倒戈清軍後，福州失守，隆武帝被處死。遭逢國難的鄭成功投筆從戎，「詣孔廟焚所著儒服，拜辭而去」，聚兵於南澳，欲討伐清軍。此次的出航，在「遙聞唐王即位，改元永曆」後歸返，而初隨鄭成功於草莽聚集的起義壯士，皆已成良士精兵，甚為婦孺表率：「自南澳歸，軍聲頗震，乃略漳、泉、潮、惠諸州，守將多降。軍律肅然，兵士無淫略，至孺子、婦女與軍行爭道。」與昔日「清兵至海安，大肆淫掠」，形成強烈對比。（2）當鄭成功出兵北上欲收復南京之際，他選擇「以廈門為根本之地，改為『思明州』」，表不忘明室；循序明朝官制管理人事，「立儲賢、儲材二館，察言、賓客二司，設印局、軍器諸局，令六官分理庶政，擇賢任之。」此外，對於「諸宗室頗給贍之，諸縉紳避亂至者禮待之」。在鄭成功的經營之下，廈門業已成為明朝國勢的向外拓延。此時，英雄不再為建功立業而揚帆啟程，出

⁷¹ 闕名、曲亭馬琴舊藏識：《暹羅紀事》，無頁碼。

⁷² 關於《水滸後傳》一書之相關研究，台灣方面可以駱水玉〈《水滸後傳》——舊明遺民陳忱的海外乾坤〉（《漢學研究》第19期第1卷（2001年6月），頁219-248）、高桂惠〈水滸故事傳播中的江湖與江山——以明·陳忱《水滸後傳》的「地景書寫」與「場域效應」為主的討論〉（《東華人文學報》第10期（2007年1月），頁157-180）、曾世豪〈戲擬與感舊：論《水滸後傳》對《水滸傳》之再現模式〉（《東華漢學》第23期（2016年5月），頁135-168）三篇期刊論文為代表。而中國方面，其成果豐碩，除已有尚魯云〈20世紀以來《水滸后傳》研究綜述〉（《安徽文學》第10期（2009年4月），頁33-34）專文簡介2005年以前國內研究焦點、成果并述評之外，此後尚有學位論文如袁實秋《陳忱遺民思想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8年）、仁婷婷《《水滸後傳》研究》（河南：河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2年），或單篇論文如易永姣〈華夏文明的詩意棲居地——論《水滸后傳》的暹羅世界〉，《懷化學院學報》第27期第3卷（2008年3月），頁56-58、陳才訓〈陳忱《水滸后傳》的文人英雄觀——以《水滸傳》為參照〉（《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1期（2011年3月），頁74-79）等數十篇成果已經出版，限於篇幅之囿，此處不一一列舉。

航即是歸返。(3) 鄭成功出征南京終以喪敗收場，於是在紅毛通事的裡應外合下收復台灣，意欲另起爐灶。縱使此時「永曆蒙塵南裔，聲問不通、存亡難詳」，站在邊陲位置的鄭成功，目光始終投向中原（明室之所在）。先是改台灣為「東寧」，赤崁樓為「承天府」，並設「天興」、「萬年」二府；既而清廷下遷界令，「沿海數萬里，盡委而棄之，英雄無用兵之地」，鄭成功不得返回王朝，於是「息兵休農，以俟時至」，並「制法律，興學校，計丁庸，養老幼，臺人大安」，直至明亡。文末云：

自成功始起義，迄此凡三十八年，而明之正朔始盡於天壤間矣。清主嘗謂其臣曰：「成功明室遺臣，而非吾亂臣賊子也」。康熙三十九年，特詔令成功及子經喪歸葬于南安焉。⁷³

最終，鄭成功沒有完成復國的心願，然而在齋藤氏巧妙營構之下，藉著其在台墾拓、使台灣成為王化之地的種種描寫，以及清朝康熙帝對其忠烈行誼的表彰，讓這名游離海外的英雄亡魂，得以另一種形式踏上歸程。

歸返作為《海外異傳》敘事結構中最後的單元情節，象徵海上英雄一段驚心動魄航程的完結。然而，對於隱藏在小說背後的作者來說，更深一層的現實考量是：英雄如何安身立命？

嘉永年間包括《海外新話》在內，以鴉片戰爭異聞為主題的小說蓬勃出版之際，彼類讀物因涉及海外時事，頗遭幕府禁制，儘管如此，小說對於清兵抗夷匪之英勇事蹟的歌頌，乃至於《海外新話拾遺》、《海外余話》中被作者誇大渲染「生擒王妹」的虛構故事，莫不鼓舞士氣、撼動人心。嶺田氏自稱創作《海外新話》之目的，要在呼籲世人記取清廷戰敗教訓，藉由近代西方科技以謀文明開化、富國強兵，如此，一旦面臨西方列強，方能處變不驚：「天賜前鑑非無意，婆心記事亦微衷。嗚呼！海國要務在知彼，預備嚴整恃有待。」⁷⁴相對於此，齋藤氏《海外異傳》直以歷史「傳記」取代新聞「新話」，除暗含對於幕府言論禁令的肯定，以此作為回應當時時事小說之創作風潮外，更冀望國內有志之士在了解海外情報的前提下，能就日本自身的歷史經驗總結教訓，提出足以因應當前政治型態的機

⁷³ 齋藤德藏著：《海外異傳（全）》，頁13上下。

⁷⁴ 楓江釣人：《海外新話》，序頁2上。

制策略，絕非一味要求開國通商，崇西學、倡洋務，誠如《海外異傳》題序者李門祐相（1812-1874）⁷⁵所語：「閒人多事擔閒憂，卻向世間要汗牛。安識箇中寓深慨，勝他防海萬言籌。」⁷⁶可以說，普遍反映當時保守佐幕派的知識分子面對國際事務的態度。

對於幕府政權該如何因時制宜、進行改革，齋藤氏亦有一套獨到之見解，或曰：

夫學有道有藝，非道則本不立，非藝則用不周。本末兼舉，體用并修，而後其功乃全。故古者學校教士，以孝弟為先，以修齊治平為歸。而其藝有禮樂，有射御，有書數，凡供家國天下之用者，莫不講貫習熟焉。是以其士一旦服官任事，皆稱其職，所以致濟濟之美也。及漢唐以後，漸失古意，以記覽為學，以辭章為業。其取士，或以辭賦，或以經義帖括，或以八股時文，其事需而不實。於是所學非用，所用非學，人材之不及古，勿惑也。⁷⁷

又云：

夫泰西諸國之於天文地理以下之技，並非支那所及。獨其所謂道，妖邪怪誕，不可方物。比之我聖人繼天立極，光明正大，為萬世標準者，猶如燭火之於太陽，鬼魅之於麟鳳，豈可捨此取彼哉！⁷⁸

上述二段引文皆出自〈順正書院記〉，撰成於嘉永二年（1849）以後。順正書院位於京都洛東瑞隆山南禪寺旁，係幕末著名西醫新宮涼亭（1787-1854）出資所建，成於天保十年（1839）。新宮氏平生「業精于醫而志篤于儒」，⁷⁹雖長於蘭學西醫，

⁷⁵ 伊東祐相，字寵卿、龍卿，通稱彥松、修理，號李門。生於文化九年，卒於明治七年。文化十二年（1815）襲封日向飢肥藩主，天保二年（1831）建藩校振德堂，並舉用儒者安井滄州（1767-1835）、安井息軒（1799-1876）父子二人為教授。兼善書畫詩歌。相關生平軼事，參酌《国書人名辞典（第一卷）》，頁160。

⁷⁶ 伊東祐相：〈讀海外異傳〉，《海外異傳（全）》，題詞頁2下。

⁷⁷ 齋藤正謙：〈順正書院記〉，《拙堂文集》，卷1，頁34上下。

⁷⁸ 同前註，頁35下。

⁷⁹ 川田興：〈順正書院記〉，新宮正亮編定：《順正書院記并詩・記》（京都：新宮氏藏板，明治

篤信儒教，並以儒者自居。嘗憂世教衰蔽，以為「天下不可無政，政不可不由教，教則自格物窮理，以至變化其氣質，必期育人材、充世用，使人人心術身體、日用事業皆由順正而後止」，⁸⁰遂建書院。書院建成十餘年以來，「諸名士以文記之者，累十餘篇」，⁸¹而新宮氏再商請齋藤氏記文的理由，除是因著兩人擁有相仿的政教理念使然，更是身為一名漢學者在新舊世代之交替下，其所產生的憂患意識，以及欲維護傳統文化的使命感，欲有所作為。

齋藤氏借儒家之道藝、體用、本末二元論，闡明東、西二學之差異。首先，其雖肯定西學技術適得其用，然而敬信天主教理卻是「妖邪怪誕」、「鬼魅」、「燭火」般，虛妄不實，不如孔孟之教的博大精深，普世恆久。換言之，西學雖精於藝，實昧於道，如世人欲求諸西國學問，則當效法新宮氏「修喁蘭之學，至於其道則擯棄之，以為異端，篤信孔孟而尊奉之，無他岐之惑」，⁸²方可已矣。其次，齋藤氏指出中國孔孟之道原具兼備本末、並修體用之特性，傳衍至後代，古意盡失、虛而不實，其癥結在於朝廷取士制度失當。其云：「文必原本經術，故韓子曰『約六經之旨以成文』，且所謂約六經之旨者，不止作文之說也。治經之法，亦當如是。唯能約經旨，故不拘章句、不泥訓詁，施而行之，無所窒礙，是信為通儒全才。」⁸³苟其所學非能經世致用，成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士子又何以「供家國天下之用」？如進一步就《海外異傳》中對於鄭成功年少業儒，「讀書穎敏，不治章句」，又或南明偏安時期，於廈門、台灣服官任事、治理兵民的諸片段描寫來看，鄭成功人物形象的塑造，可謂具體而微的展現齋藤氏欲興教化、得人才，急救應變以解國家西顧之憂的政治願景。

對於齋藤氏而言，養才既是刻不容緩之事，上位者如何擢拔人才，使其各有所用，更是落實政治理想之桎梏。《海外異傳》中標舉的三位草莽英雄，或有得上位者之賞識而成就海上霸業，或有亡失明君而以見敗收場。儘管英雄敗北在日本傳統軍記文學作品裡，已是老生常談的主題，⁸⁴從中世紀軍記物語之嚆矢《將門

二年〔1869〕木刻本，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藏），頁12下。

⁸⁰ 上甲禮：〈順正書院記〉，《順正書院記并詩·記》，頁14下-15上。

⁸¹ 齋藤正謙：〈順正書院記〉，《拙堂文集》，卷1，頁35下。

⁸² 同前註。

⁸³ 拙堂先生著：《續文話》，卷8，頁3下。

⁸⁴ 梶原正昭：〈軍記文學形成の一基盤——敗者の語りをめぐって——〉，收入《軍記文学の位相》（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頁72-96。

記》，以叛將平將門被抄家、平氏墮入地獄而開展的小說情節，可以窺之一端，而稍晚問世的軍記小說，如《太平記》、《保元物語》、《平家物語》等，對於作為敗者一方的武士慷慨就義之描寫，尤其撼動人心。然而就現實政治來看，無論是楠木正成出策遷都不為後醍醐天皇所用，源為朝獻計夜襲為藤原賴長所否決，源義經因功高震主為其手足所忌、並在後白河天皇的院宣下被剷除勢力，都說明君主倘不能識人任才，將導致政權亡覆、賢才凋零的局面。悲劇英雄的出現，不是文學創作下的瑰麗產物，是歷史治亂更迭中未見輿薪的結果。齋藤氏以為：

（昏闇之主）遽聽人言而進之，遽信讒說而退之。進之欲加諸膝，退之如擠諸壑。是以才俊之士不肯為之用，甚者不北走胡則南走越……嗚呼！色之美者，為眾女所妬；才之美者，為眾士所嫉。俊傑之士、廉幹之吏，往往不容於世，人主而不愛之，誰又愛之耶？馬之駿者，或有泛駕之患；士之俊者，或有違俗之累。人主或一用之，憚其趺弛，舉而棄之，未嘗矯揉入之於規矩，烏得成其才、適其用哉！但人主之好色愛馬則多矣……至於賢才獨不然？故臣以為養才無奇策、無妙術，必也好德如好色，愛才如愛馬，則士之賢才者彬彬然出矣。⁸⁵

德川幕府偃武息兵、以文教治世以來，馬上英雄已無用兵餘地，伏案儒者取而代之，成為政治舞台上的新興英雄。迄於幕末時期，伴隨著社會內部各種矛盾的不斷激化，與對外關係日益緊張，齋藤氏一方面對國初良將精兵的生不逢時，心生「海內承平兩百有餘年，雄偉非常之士，默默老死者何限」⁸⁶之嘆；另一方面，對於躬逢其時卻懷才不遇的儒者，不免英雄相惜，輒為發出不平之鳴：「材之長短大小，各有所宜，顧匠人所用何如耳……今雖下世，嗣侯賢明，典型具存矣，其用材也，亦以先侯為法可知已。苟士之有材者，不至廢棄不用必矣。」⁸⁷正因治亂之用，唯人才為急，若人主不能愛其才能，其雖有賢不得自顯，雖有才不得自効，豈非國朝憾事？或謂養才之道無它法，唯有好之、愛之，賢能可以不請自來、不養而出，天下英才雄俊終將各得其歸。

⁸⁵ 齋藤正謙：〈養才策〉，《拙堂文集》，卷4，頁2下-3上。

⁸⁶ 齋藤正謙：〈曾我翁畫像記〉，《拙堂文集》，卷1，頁15下。

⁸⁷ 齋藤正謙：〈樞堂記〉，《拙堂文集》，卷1，頁8上。

五、代結語：隱藏於敘事背後的另一名英雄

本文伊始，曾揭櫫齋藤氏所著之《海防策》。是書完成於《海外異傳》上梓前七年，然在齋藤氏有生之年裡未曾將其正式刊行。策凡五論，包含：（1）就日本特出的地理形勢（國土狹長、以農立國）、人民特質（精悍敏捷），以及兵器陣法，來思考如何抵禦外虜。（2）指出戰略之重要性，如軍事訓練、活用兵器，並提出道理（體）重於器物（用）的觀點。（3）提出平日武備之重要性，如提高生產、倡導節約、協調各藩機制，以及重視練兵與治民。（4）對蝦夷地區與琉球的防衛。（5）除留心於西洋諸國的武力侵略，面對西方文化思想之侵略亦不容忽視，並視耶穌教為邪教。⁸⁸如是觀點，即便在齋藤氏於嘉永六年（1853）年上書幕府的問答策論《制虜事宜》中，仍舊不變。如將二策內容與小說併觀，幾乎可以說，《海外異傳》就是其海防思想的理想落實結果。

一旦將小說放回嶺田氏《海外新話》創作系譜中來看，小說名曰「異」之意義則呼之欲出。（1）在體例上，它與綱舉目張、文字雅馴的正史列傳不同，不應將之視為尋常的傳記作品。（2）相對於「新話」而言，這本異於正史傳記又非新聞改寫的小說，它被賦予作者對讀者的雙重閱讀期待——試圖跳脫小說屬「稗官野史」的刻板印象，並且嘗試發明「虛構」文本背後那作者「真實」的政治意圖。或許是《海外新話》出乎意料地受到地方知識分子與市井百姓的喜愛，讓齋藤氏萌生創作契機，不過在重於實學考證的時代氛圍下，對大部分的儒者而言，這種創作方式顯然太過「標新立異」，縱使是「詩文兵定成三話，才學識應歸一身」⁸⁹的碩儒，亦難以撼動此保守學風。如三山谷曾批評：「所傳三人，非本邦人則生於本邦者也，書明絕不見此意。又如列異傳及異記異苑之屬，凡以異名者，率係幻怪荒謬之說，是書無乃非類乎！」⁹⁰此後更逐一考覈小說內容不如史傳之處，最終掩蔽作者原來取名「異傳」的用心，也曾引來時人對於《海外異傳》未能精於

⁸⁸ 二策刊行於齋藤氏歿後，全文見載於齋藤正和編之《拙堂會報全附茶磨山莊誌》（三重：菰野町，2001年）中，相關議題參酌氏著：《齋藤拙堂傳》，頁130-142。

⁸⁹ 齋藤正謙：〈廣吉甫題余詩稿三絕句〉云：自古詩文分二途，作家具體或偏枯。君能兼得熊魚味，欲繼昌黎與大蘇。悉說海防間火攻，世間幾個假英雄。不知誰得真詮者，清有魏源吾有公。一別東土十五春，再逢此地益相親。詩文兵定成三話，才學識應歸一身。余亦次韻，以題吉甫詩稿三首，《鐵研齋詩存》，卷7，頁153。

⁹⁰ 三山谷：《海外異傳商榷》卷上，《三山谷先生遺稿》，頁281。

徵實的刻板印象。

無論如何，對齋藤氏來說，立下汗馬功勞之民族英雄固然可歌可泣，而為這群崛起於亂世之英雄留名丹青的文人，同樣令人肅然起敬。或謂：「聖賢之道術非文不明，古今之事業非文不傳。故古人以為貫道之器，又以為經國之業，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哉。清胡天游曰：『古今人皆死，唯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離文章，則其人皆死。』天游此言雖不免有圭角，然論實痛快。」⁹¹當齋藤氏通過刻意为之的符號表述與敘事策略，逐步建構山田長政、濱田彌兵衛與鄭成功三位傳主精忠義烈的愛國形象，並使之成為後世師法的道德典範之際，與此同時，更以書寫的方式證明自身對幕府的效忠。不妨就其為津阪東陽（1758-1825）《楠木誌》所撰序文，以證乎此番言論：

噫嘻！文節之於楠氏亦可不謂忠臣耶？余嘗竊謂我邦皇統萬世，與天壤共敝，雖曰神明之遺德，而不可不謂忠臣義士亦與有力於其間焉。而前於楠氏者，莫盛於楠氏，後於楠氏者，亦莫盛於楠氏，至今五六百年，士大夫欲忠於其君者，皆師法中將。是中將為天地植綱常，為人倫垂軌範也，萬世臣道之鑑，於是乎立矣。故楠氏之忠於一時，乃所以忠於萬世。而文節忠於楠氏，亦所以忠於皇國。何也？蓋欲師法楠氏，不可不詳楠氏事蹟，捨此書將安求焉？苟此書之行，必能廉頑立懦，扶綱常、裨人倫，亦不少小。此文節之所以忠於皇國，而余所以深有取焉。⁹²

此處所言「忠」，或有二義：（1）文節之於楠氏所以可謂忠，蓋因其纂輯文章能忠於刻畫傳主人物之人格風度，詳於發明其行懿事蹟，使來者讀之宛在面前。齋藤氏嘗據清方苞批評班史備載王莽之事為例，指出其文雖記史，實則「徒以著其譸張為幻」，「而喋喋不休，以為後人詼嘲之資，何異小說家駁雜之戲乎！」⁹³強調為歷史人物立傳記文，當以再現其精神為第一義，此絕不同於小說家為求談資之趣，而流於誇張怪誕、混淆視聽的敘事風格。（2）文節之於皇國亦可謂忠，蓋因能假文字闡明前朝英雄事蹟，使人人讀之，欲倣其人格，廉頑立懦，激勵風俗，或有

⁹¹ 拙堂先生著：《續文話》，卷4，頁1上。

⁹² 齋藤正謙：〈楠木誌序〉，《拙堂文集》，卷3，頁13下-14上。

⁹³ 拙堂先生著：《續文話》，卷3，頁8下。

補於世。何況文人之與英雄，「各有所長，時有所用，豈二者卒不可合耶？」正是「文非鉛槧也，必有處世之才；武非劔楯也，必有料敵之智」，⁹⁴二者不可截然分開。是故，子節著《楠木誌》，齋藤氏作《海外異傳》，其著述之功業堪與筆下之英雄比肩；而其赤膽忠烈、憂國懷民之心，又與昔日英雄互為映發。

⁹⁴ 拙堂先生著：《續文話》，卷4，頁13下。

徵引書目

一、原典文獻

拙堂先生著：《拙堂文話（正、續編）》，京都：出雲寺文次郎等，天保六年，1835年跋刊本。

林子平著：《精校海國兵談》，江戶：大和屋喜兵衛，安政三年，1856年，刊本。

新宮正亮編定：《順正書院記并詩·記》，京都：新宮氏藏板，明治二年，1869年，木刻本。

楓江釣人：《海外新話》，京都：嶺田氏藏版，嘉永己酉，1849年，刊本。

盧千里著、原三右衛門校：《崎陽先民傳》，東都：慶元堂，文政二年，1819年，刻本。

嶺田楓江：《楓江遺草》，東京：重城保，1891年。

齋藤正謙著，中內惇編：《拙堂文集》，東京：山中市兵衛等，明治十四年，1881年，刻本。

_____著：《鐵研齋輜軒書目》，刊本出版地、年代不詳，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齋藤拙堂撰、齋藤正謙評：《鴉片始末》，寫本年代不詳，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齋藤德藏著：《海外異傳（全）》，大阪：河內屋喜兵衛，嘉永三庚戌年〔1850〕刊本。

關名、曲亭馬琴舊藏識：《暹羅紀事》，寫本年代不詳，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二、近人論著

王三慶等主編：《日本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3年。

_____著：〈東西交流史上漢文小說所表現的文化衝突〉，《成大中文學報》第17期（2007年7月），頁1-30。

江仁傑著：《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歷史》，台北：三民書局，2006年。

- 周一良：《中日關係文化史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 林景淵：《濱田彌兵衛事件及十七世紀東亞海上貿易》，台北：南天書局，2011年。
- 黃軼球：〈漫談日本漢文學名著——《拙堂文話》〉，《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卷（1985年），頁66。
- 詹森主編、王翔譯：《劍橋日本史（第5卷）：19世紀》，北京：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
- 駱水玉〈《水滸後傳》——舊明遺明陳忱的海外乾坤〉（《漢學研究》第19期第1卷（2001年6月），頁219-248。
- 薛建蓉：《重寫的「詭」跡：日治時期台灣報章雜誌的漢文歷史小說》，台北：秀威資訊，2015年。
- 韓妍艷著《嶺田楓江の思想と行動—『海外新話』を中心に—》，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2016年。
- 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著、周祖達譯：《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業績》，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 山田日本漢文小說研究会編：《日本漢文小說の世界：紹介と研究》，東京：白帝社，2005年。
- 市古貞次等編：《国書人名辞典（第一卷）》，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
- 竹内尉著：《海とその先駆者》，東京：健文社，1974年。
- 奈良縣高市郡教育會：《三山谷先生遺稿》，奈良：奈良縣高市郡教育會，1917年。
- 岸本美緒：〈『夷匪犯境録』の形成と流伝〉，《お茶の水史学》卷61，2018年3月，頁73-110。
- 明石吉五郎：《嶺田楓江》，東京：博文館，1919年。
- 武内博：〈『海外新話』の著者嶺田楓江と英人閻斌士〉，《日本古書通信》第50卷第2號（1985年2月），頁5-7。
- 芳賀登監修：《日本道德教育叢書（第8卷）》，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1年。
- 長沢先生古稀記念図書学論集刊行会：《図書学論集：長沢先生古稀記念》，東京：三省堂，1973年。
- 長政顕彰会：《山田長政資料集成》，静岡：静岡教育委員会，1974年。

津市教育會：《津市文教史要》，津市：津市教育會，1938年。

宮武外骨：《筆禍史（全）》，大阪：雅俗文庫，1911年。

島田泰夫編輯：《節齋遺稿》卷上，東京：博聞社，1881年。

梶原正昭：《軍記文学の位相》，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

渡辺守邦：〈海外新話一件始末—近代へのもう一つの可能性—〉，《言語と文芸》第76輯（1973年），頁173-174。

鈴木正崇：《山岳信仰》，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5年。

增田涉著，由其民、周啟乾譯：《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

齋藤正和著：《齋藤拙堂傳》，三重県：良書出版会，1993年。

齋藤正和編：《拙堂會報全附茶磨山莊誌》，三重：菰野町，2001年。

齋藤拙堂原著，齋藤正和譯著：《全釈拙堂文話》，東京：明德出版社，2015年。

齋藤拙堂撰，吳鴻春輯校：《鐵研齋詩存》，東京：汲古書院，2001年。

Naval Battles Against One's Enemies Shock the World: A Study on the Hero Writing of The Japanese Chinese-Character Novel Kaigaiden

Liu, Chia-Hsin*

[Abstract]

In the 1850s, Japan was roiled by domestic turmoil and foreign invasion. Rocked by the violence of Western gunboat diplomacy, the Edo Shogunate struggled to formulate an effective policy in response, as it lost completely its political authority. Farsighted people lobbied around the country and gathered supporters, advocating strenuously for the return of political power to the Mikado (the Emperor) as a means of resisting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 As such, calls for the overthrow of the Edo Shogunate became greater and greater. Saito Setsudo (1797-1865) was a well-known scholar in Tsu-han and a supporter of the Shogunate. In 1850 he published the Chinese-character novel *Kaigai iden* (海外異傳) as a means of articulating his political stance. The novel was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a tense and even chaotic time when East Asia countries were roiled by political conflict. The work's narrative structure was organized around the plot points of "sailing out, attacking enemy, then returning in triumph." It described three overseas battles: Japanese Yamada Nagamasa (1590-1630) conquest of the kingdom of Siam, Hamada Yahyōe threats against the Dutch governor of Formosa, and Koxinga (1624-1662)'s post-Ming rule on the island of Taiwan. In the narrative development of each these individual instances of warfare, the author envisions the movement "from the land toward the sea" as a stage upon which each of his central folk heroes could exhibit their martial resolve. This paper will

* Foreign researcher of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Japan.

examine how the depiction of such martial activity became a means for Saito to metaphorically express his political ideal: the need for Japanese patriots at the end of the Edo period to unite against the Western powers.

Keywords: Saito Setsudo; Kaigai iden; Japanese Chinese-character novels; land and sea; heroes writing

